

# 闪烁间的现代性:近代舆论观念视域下的红绿灯

张晨怡 陈子恒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红绿灯,是近代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之一,率先在上海租界得到使用。其后,在“进步”的宣扬声中,红绿灯被逐步推广到许多城市的道路交通管理中,并成为市政当局用来宣扬政绩的对象。红绿灯的设立,虽然被视为进步,但也因其不完善受到部分质疑。在近代社会特殊环境下,红绿灯还潜藏有洋人对华人、城市居民对进城的乡人,强对弱、高对低的歧视性暗语存在。时人将红绿灯作为象征符号,阐发自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念的见解。红绿灯作为透视当时市政建设治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国民交通规则意识塑造、社会价值观念倡导等诸多问题的窗口,汇聚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键词:**红绿灯;近代舆论观念;市政建设;规则意识;价值倡导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6-0066-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607

对于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红绿灯(即交通信号灯),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与社会互动,学界关注不多<sup>[1]</sup>。部分学术著作<sup>[2]124,258,270,277,293,297,309</sup>在研究全面抗战前民国时期上海的电车交通时,提及了交通信号灯实际运用于交通管理中,并写入交通规则,但并未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研究。另有文章以1919-1937年上海的交通信号灯为对象展开研究,主要关注作为管理主体的上海租界与华界的市政当局,推动不断改进交通信号灯这一交通管理新设施的历史进程<sup>[3]</sup>。同时也关注到当时社会公众对市政交通信号灯建设推行的意见反馈,但仍将其视为当局管理效能的映证和陪衬,未能更多发掘被管理者发出的话语声音,也没有深挖社会公众对其更为复杂多面的反响与讨论,更鲜有涉及其背后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本文拟充分利用近代报刊等资料,探究红绿灯这一舶来品,在近代中国城市设置与推广的过程中,人们对其认知观念所历经的嬗变,以及红绿灯如何影响塑造国民的交通安全规则意识,如何融入大众生活,进入社会话语体系当中;最终又被社会公众如何加以论述,赋予什么更深层的意义,体现出怎样的价值倡导与社会文化内涵?

## 一、红绿灯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形象宣扬

红绿灯自19世纪50-60年代于英国伦敦问世后,在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普及开来,进而随着开埠通

**收稿日期:**2022-09-09

**作者简介:**张晨怡(1976—),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陈子恒(1997—),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学与晚清国家治理研究》(21BZS091)。

商和租界的开辟传入中国。标志着“进步”的红绿灯及其相关知识与正面形象,也在多种类型的宣传下,于民众中逐渐普及开来。

### (一) 从租界到华界:红绿灯在近代中国的传入

红绿灯在近代中国最早并非用于管理城市道路交通,而是指挥轮船与电车。在清末外国轮船于中国内河航行通商之时,就已经在紧要处设置红绿灯,作为信号标识用以指挥过往船只。《张文襄公全集》中有关于红绿灯指挥轮船的记载<sup>[4]2240</sup>。1907年,法商电车公司在窄桥会车处设红、绿信号灯各一只,由专人操纵,被上海人叫做“红绿灯”<sup>[5]</sup>。

1919年,近代中国城市道路交通中首个红绿灯诞生于上海的法租界。其时,法租界公董局因红绿灯初步装设试验收效不错,遂在法租界进一步推广红绿灯的安装,“在法租界所有路口设置红绿灯信号,特别是过往车辆太多的路口,这完全是必要的;如新的信号系统在法租界的普遍应用证明是成功的,也考虑之后在公共租界使用红绿灯管理交通。”<sup>[6]</sup>对此,《民国日报》报道:“法公董局已决采用夜间指挥,交通之新制度,于各路交叉处设红绿灯信号台,盖因交通日繁,不能不有此种戒备也。”<sup>[7]</sup>

此后,红绿灯从上海的法租界推广到公共租界,再到华界,并走出上海,逐步普及到更多的城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已经有上海、北平(北京)、天津、汕头、广州、南京、杭州、南宁、桂林、归绥(今呼和浩特)、西安、重庆、青岛、贵阳、福州、南通、武汉、兰州等将近20个城市先后装设了红绿灯。另需说明,这段时间装设和使用的红绿灯大多是“人工化”管理的红绿灯,即需要巡捕或交通警察手动操控红绿灯的变化和开关,有时还辅之以红绿灯旗,配合进行交通指挥管理。囿于财政资金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只有在上海等几个东部大型城市,配备使用少量的主要通过计时而切换变化的自动红绿灯。

### (二) 进步的光环:对红绿灯形象的宣扬

1934年3月,上海华界的首个红绿灯在老西门正式启用,“那装置已久的红绿灯和很高的一个圆亭,今日已有几个警士在其中开始指挥交通,而红绿灯也放光了;同时来往的车辆,也就依着次序而进行,不像从前那样散漫无状了。”<sup>[8]</sup>见闻者给予此事以“在华界方面还是第一次创举”的评价,“设备方面虽然不见得怎样周到,然而在现财政困乏经济不足的时候,居然也有这大规模的新建设,未尝不可说我们的市政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sup>[9]</sup>红绿灯在华界的启用,带来的不仅是市政面貌和交通管理的进步,更是人们对市政当局的期望,“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继续努力,扩大建设,将上海建造成为一个更伟大的都市;同时也希望市民能信任和帮助政府,再不存一种偏颇的心理才好。”<sup>[9]</sup>随着红绿灯在城市间的推广,报刊媒体在报道本市装设红绿灯时多称“建设有进步,繁华有秩序”。红绿灯逐渐成为了市政建设进步和交通秩序井然的标杆与代名词。

随着红绿灯安设的日益广泛,为保证红绿灯的有序运行和民众的交通安全,向民众介绍宣传红绿灯的用法和规则就成为必要。每当一地首个红绿灯装设时,市政当局都会发出通告,通知民众使用方法,并逐步将红绿灯写入交通规则之中。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的交通规则公告,相比此前版本明确增加了交通信号的含义以及要求遵守交通信号的要求<sup>[9]</sup>。然而通知布告的宣传力度毕竟有限,于是许多报纸、期刊和杂志扛起了向社会公众介绍和宣传红绿灯相关知识的大旗。

第一种是面向少年儿童,采取朗朗上口的儿歌或简单易识又生动有趣的插图。1933年,《小朋友》刊登了一首短小精炼的儿歌,名为《红绿灯》:“红绿灯,十字路口站端正;绿灯行,红灯停,多少车马行人听命令!”<sup>[10]</sup>并附背景插图。短小精炼、朗朗上口、易懂好记的儿歌,再配上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表意明晰的背景插图,有着较好的交通安全宣传与教育效果。还有一篇《交通常识——红绿灯》内容更为丰富,先后介绍了最简单“红灯停、绿灯行”的红绿两色灯,改进过的红黄绿三色灯和最新式的不用人力控制的“自动交通讯号灯”<sup>[11]</sup>。这样的宣传教育,不只是对小朋友,也能对所有读者起到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普及效果,进而增强社会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第二种则是面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红绿灯的知识,形式较为丰富,既有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又有通俗性诗歌,还有用词严谨的方法说明。如《都市街道上交通红绿灯怎样自动变换》<sup>[12]</sup>一文以专业详细的图文,将自动红绿灯的每一个组成部件和运行细节都阐释得细致入微。另有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的文章,如《科学画报》介绍了三种红绿灯:由计时器控制灯光变换的自动红绿灯,交通警察手动开关的红绿灯,可以减少人力成本投入的感应式红绿灯<sup>[13]</sup>。章楚《红绿灯之研究》一文以丰富扎实的数据、条分缕析的阐释、图文并茂的铺陈,对当时的红绿灯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他认为是否安装红绿灯以及安装什么样的红绿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一些小城市和人力车多而汽车不多的街区均无安装之必要,如不加区别地盲目安装,不仅耗费大量财力,还可能导致更多的拥堵和紊乱。文章还指出:“我国人民,对于警察指挥之命令,素不重视。若装置红绿灯之后,人民对之视若无睹,则非但失去了装置之本意,反能增加意外事故及紊乱,失策孰甚。故不装置红绿灯则已,若一经装置,交通警察必具有强迫人民服从红绿灯之指挥不可。”<sup>[14]</sup>此外,警界人士也采用如新诗这样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普及红绿灯。上海徐庆明警士写了一首短诗《红绿灯下的交通警》<sup>[15]</sup>,讲的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每日见闻,读来轻快顺口,节奏朗朗,不知不觉就给人留下印象,倒也不失为一种有趣又有效的宣传方式。《青岛警察月刊》上的《交通警察常识:红绿灯黄灯使用方法》,用简洁精炼的文字介绍了红、绿、橙黄三种灯的组合使用方法和车辆转弯规则<sup>[16]</sup>。

## 二、红绿灯:交通秩序背后的差异化认知

近代社会中,红绿灯作为“进步”的象征,被其时的主流话语所认同与宣传,但这并非其全貌。其存在的问题遭到了一些社会舆论的质疑乃至诟病。红绿灯设置初衷是为了交通的有序,然而,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因地域发展不平衡与阶级阶层间的差异,红绿灯之下还潜藏着强对弱、高对低的歧视暗语。

### (一) 红绿灯所受舆论质疑

有质疑者将矛头直指红绿灯之红、绿两色,如“马路中心的红绿灯,的确是一种可怕的象征。因为红是恐怖的色彩,绿是凄惨的颜色,所以在红绿灯之下底车辆与行人,穿梭一般的交织着,往往发生恐怖的景象,演成凄惨的悲剧。”<sup>[17]</sup>该作者将红、绿两色渲染为恐怖凄惨之感,以映衬突出红绿灯下交通事故之恐怖悲惨。当然,正如当时许多研究和报道指出的,红绿灯的装设总体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特别是致死率。这一描述仅抓住一个场景或几起交通事故来论证,虽不甚严谨科学,但也是一种感性认知与思维的反映,客观上使人们更加敬畏红绿灯。

另外,还有人就红绿灯与色盲问题展开讨论。《色盲之人驾车危险堪虞——宜改良红绿灯以资补救》一文认为,占到人群百分之四的色盲患者当中,十之有九是红绿色盲,在红绿灯应用于车辆交通管理已甚普遍的当下,所含危险性极大。一些色盲人士平日生活或许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方法推断物体颜色,但在红绿灯这里却难以派上用场,这就给他们增加了风险。作者提议要以颜色测试来对驾驶人员进行筛选,保证其中不能有色盲患者,但对为数众多的行人就无能为力。作者随后提出“较为妥善之补救方法”,即“废弃仅恃颜色互异以指挥车辆行人之交通灯,而采用由形态、位置及颜色三方面以显示区别之交通灯”<sup>[18]</sup>。文章分析不乏合理之处,给出的建议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积极求变,但囿于当时主客观条件限制,似乎很难真正落实执行。迄至今日,作者的不少建议已成为现实,如今天驾考中必要的一环,即是针对色盲色弱项目的体检审查;街边绝大多数示意行人的红绿灯,红灯为站立的红色小人,绿灯则是行走的绿色小人,还有的加入了声音播报提醒,指示元素更为丰富多样,也尽量照顾到更多不同需求的人群。

此外,其时因过街行人不识红绿灯之警示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在少数。1939年3月8日下午,32岁的宁波人尤良良“甫自原籍来沪,因不谙沪地交通情形,自南朝北在福建路经过南京路时,并不注意交

通灯指示,致被电车猛撞倒地,送医不治身亡”<sup>[19]</sup>。这位行人从宁波来到上海,不知晓亦不注意交通灯的指示,本是红绿灯知识宣传普及的不到位,却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二)“笑”话之中的红绿灯

其时,关于红绿灯的趣事笑话常见诸报道。诸如:

一乡人初到沪上,其友告知曰:欲穿马路时,须留意路旁之红绿灯;红灯明时不可行也,行之恐有危险。是夜,乡人于路中见一木凳上悬有数盏红灯,即呆立于路旁。有人问其故,对曰:汝见红灯否乎?<sup>[20]</sup>

官巷口装设红绿灯以来,笑话几乎天天有。昨为星期日,观看红绿灯者益多,一般市民以为发生何事,这就越聚越多,后经岗警解释,方走散。据某路人谓:有一乡巴佬欲乘公共汽车,将交通警察岗站误作售票处。<sup>[21]</sup>

这些看似闲谈轻松的笑话背后,暗含的却是一种恃强欺弱的话语逻辑。一些人倚仗自己居于城市更了解红绿灯,去嘲笑、鄙夷甚至歧视未见过红绿灯的乡人,无疑是对原本标志公正平等之红绿灯的一种讽刺。

还有一则翻译过来的国外红绿灯的小故事:

一个名叫摩西的黑人老伯,在他难得去到城里的一次观光中,因驾车闯红灯被拘捕了。审判官让他解释原因,他辩解道:当时我在车上注意的观看着,当绿灯亮时,我见到所有的白人们都走了过去。所以,当灯光变红的时候,我自然以为这应是让咱们黑人过去的时候啦!”<sup>[22]</sup>

这里,借助红绿灯直接讽喻的是一些国家带有歧视性质的种族隔离现象,这带给被歧视者的影响远比法条法规深刻得多,同时另一层含义恐怕也是暗指当时不平等的阶层差异。

这些小故事或者小笑话均以红绿灯为具象,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在体现一种对比,标榜着平等的红绿灯之下,却有着高者对低者、强者对弱者的嘲讽、讥笑、鄙夷甚至歧视。两相对比,所表之意味更加强烈而深远。

## 三、现代价值观念的倡导:作为象征符号的红绿灯

近代以降,随着红绿灯不断更深更广地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其也日益为人们所认可和肯定。红绿灯从一个具象的客体事物,逐渐演化为一种象征符号,进入时人的认知观念与话语讨论之中,并成为社会舆论表达的重要媒介。

依据皮尔士的符号学,符号现象的三个方面为符号、对象、解释项,客体对象决定符号,符号决定解释项,而客体又通过符号中中介间接决定解释项<sup>[23]</sup>。在本文中,红绿灯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物件时即为客体对象,作为指代这一物件及其背后一整套运行机制规则时就成为了符号,而解释项即时人如何认知看待以及进一步理解诠释红绿灯符号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也受到解释者所处的社会或共同体的规范的制约。故时人对红绿灯符号的诠释并非随心所欲,每一个观点、每一种看法,都是由当时客观存在的红绿灯运作技术和运行机制所决定,也是特定社会观念和舆论的表现和反映。

换言之,时人对红绿灯客体对象和象征符号的解读诠释,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甚至影响到某些社会观念和舆论。因此,透过作为象征符号的红绿灯这一窗口,能够很好地从一个侧面探视当时社会的一些思想观念和舆论看法,如各种政治见解、观点和对理想社会价值观念的倡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近代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一方面,红绿灯符号是人们对理想社会价值倡导与追求的反映和媒介;另一方面,媒介符号也有主体性与能动性,同样能发挥促进理想社会价值的表达、宣传和最终实现的功效。

1930年,《新闻报》刊登《红绿灯》一文,作者借由红绿灯阐发其关于“自由”的观点,“最利用时会

者,也是最善于行使自由权者。譬如一个人在马路上行走是自由的,可是一到了十字路口就有问题,亮了绿灯便可以前进,亮了红灯便只好停步。有行不去的时候,断乎不能一意孤行,假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直冲,非但要受警察的干涉,而且可以说是闯祸的根源。因此一个人如果见了绿灯而不走,就索性在马路旁边闲宕一会儿,不必再走。假令绿灯光中不走,换了红灯反急不择路,忘了‘马路如虎口’那句话却是何苦。然而我们竟往往看见有些人,对着绿灯偏要闲望,冲着红灯偏要开步,这又是一种不可解的心理了。”<sup>[24]</sup>该文以红绿灯为生动形象的比喻,指出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反叛求异,不守规则的自由只会害人害己。在这里,红绿灯是论述自由问题的典例,也被作者塑造成行使自由的规则保障。

此外,红绿灯还被时人视之为代表着平等与公正。《警察画报》刊载一张照片:上海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之警员,采取科学管制交通方法,利用红绿灯指挥交通;并配文“红绿灯下国民一律平等”<sup>[25]</sup>。这是管理者所宣扬的,也是公众所期望实现的。《世界日报》上刊有一封读者来信:“‘红停绿行’,老百姓走到了十字路口,见了此灯的信号,无不顺从。可是小民真不明白,竟有那华丽壮观而车前还标着某某部的要人汽车不顾一切的向前开行,也不管行路人的性命之安全。莫非因为十字路口行人多,好在老百姓眼前出出风头?也许是司机先生是近视眼?若是犯了前者毛病的话,小民要不客气的呐喊一声,请速改遵守交通法则,以及国家法规;若是犯了后者的话,请告明坐汽车的要人,急速另用非近视眼的司机。倘若二项皆非,那么坐汽车的行在十字路口时,也须耐性按照安全灯信号停与开,以维护交通安全法规,同时亦增了国家交通警的无上威信。”<sup>[26]</sup>

时人还大力赞扬红绿灯之公正,有威信:“车行往来无不遵红绿灯,有不遵则惩罚。有人谓区区一红绿灯,何以有如此威信?而皇皇政令,何以并红绿灯而不如?我道是在掌管红绿灯者自保其威信耳。而其要在惩罚得当,决不可稍有所偏,假如应惩不惩、应罚不罚,别有用意,则是自失其威信也。至于往来车辆苟不遵行,或则伤己,或则伤人,或则人已并伤。犹之内战者之两败俱伤耳,然两败俱伤虽属咎由自取,究之掌管命令者,应惩者惩、应罚者罚,其威信要当以红绿灯为取法也。嗟乎!吾甚佩掌管红绿灯者之能保其威信也。”<sup>[27]</sup>既赞扬掌管红绿灯者运用红绿灯时惩罚得当、不偏不倚,因此保有威信;又以此作比喻,批评政府当局之政令不如红绿灯有威信,更指责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兴内战,导致两败俱伤,掌管这一命令者应当受到惩罚。陶在东也发表相似观点:“绿灯行,红灯止,行止不达尺与咫。千车万乘观一灯,红绿威权何其伟!其实红绿无威权,威权出自人心弦。现出红绿色,现之于灯授之警,遂成交通好规则。其诀一在‘必’,必红必绿不差忒,必行必止无中立。其诀二在‘信’,绿行红止法一定。倘稍通融决无幸:一病在色多,二病在色乱;二病除,区区一灯与一警,全市经纬皆坦途。绿灯行,红灯止,治国之道亦如此。”<sup>[28]</sup>认为红绿灯管理有权威之诀窍在于清晰明了而无中间地带,如若稍稍通融,则会弊病丛生。最后感叹治国之道也应当如红绿灯这般,是非分明、规则统一。

红绿灯作为“法”——交通法规的具象物征,其功效和权威均以法为保障。因此,时人将红绿灯与法治联系起来的论述颇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岳森《从红绿灯说到法治》一文:

十字街头的红绿灯是民主的初步课题,也是法治的最好考验;要讲民主,法治为先,而法必上下人人一体遵守。尤其在中国,法必由上行,以官示范,人民万可敬而效之,这是培养法治的必要途径。红绿灯的明灭显示着“通”与“不通”,意即“法”与“不法”的象征。如果你站在十字街头稍加观察:哪些车辆是见红灯仍肆无忌惮地冲过?哪些才慢慢地停下?你便可以知道走路也分权贵与卑下了。我们要培养民主风气,崇尚法治精神,必须由小处着手,尤其打破权势观念,由知法的领导层做起。<sup>[29]</sup>

作者将是否遵守红绿灯作为是否守法的标志,批判权势之人无视红绿灯的管理,肆意践踏法治。作者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结合的,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要培养民主风气、崇尚法治精神,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以身作则,率先遵循。《大公报》更是刊载罗忠恕之文:

我们见着国外的警察,对任何人驾驶汽车犯了法规,警察无有不停住汽车,记下号数,然后依据法律加以处罚,就是首相和大臣的汽车,也不会放过。一次我在深夜里,街上除了我,已无第二行人,见有一汽车驾驶者,见着街头自动红绿灯发出红光,并无警察站岗,驾车的人也自动将车停止,及至发绿光时,始将车驶过。其实他不停车,也不会碰着任何其他的车,因为街上只此一车行驶,除我在走,道上并无第二行人。这种守法的态度,似乎不近情理,然守法已成习惯,也不由得他不如此。我国人民的生活,不力求养成守法的习惯,我们决不能希望政治有真民主的表现。<sup>[30]</sup>

作者以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自觉遵守自动红绿灯为守法的典型案例,论证只有人人都养成自觉守法的习惯,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红绿灯这一小小的器物,就这样与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探视国家与社会之运行是否民主与法治的重要窗口之一。

#### 四、结 语

红绿灯作为近代传入中国的众多舶来品之一,经历了清末用于指挥轮船和电车的萌芽阶段,于1919年正式诞生于上海法租界十字路口,用于指挥城市道路交通。随后由租界传入华界,由上海逐步普及到其他城市中去,被时人欣喜地称为是“华界市政的进步”,是其他城市向上海看齐的发展之举。

随着红绿灯的推广,多种多样对于红绿灯知识的宣传也随之出现,兼顾通俗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因此,红绿灯也成为市政当局用来宣扬政绩与市政革新的工具。然而,在宣扬红绿灯进步的主流话语之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针对红绿灯的质疑之声。有人从感性出发,觉得红绿两色恐怖凄惨;有人从理性出发,认为应改造红绿灯以照顾到红绿色盲人群。在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绿灯表面的平等之下却也藏有强对弱、高对低的歧视性暗语存在,洋人对华人、城市居民对进城的乡人,总有人倚仗自身对红绿灯更多的认识与了解自视为“高者”,而去嘲讽甚至歧视因客观因素缺乏红绿灯相关知识的“弱者”,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更多关注与反思。

此外,随着红绿灯在城市交通生活中的推广与普及,其逐渐演绎出作为符号的象征意。时人往往以红绿灯举例或作比,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价值观念倡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民主。五种价值倡导交汇于红绿灯一点上,呈现出更为复杂而丰富的政治社会内涵:红绿灯设置的初衷即是公正平等,保障其权威性的是法治,而法治又往往与民主联系起来;最终在法治的框架下,在民主的氛围中,在公正平等的保障下,民众才能得到真正有序之理性自由。正是借助红绿灯这一符号的助力,这些理想社会价值追求得以更好地在社会舆论中表达和宣扬。

透过近代舆论视域下的红绿灯,我们不仅可以得窥近代城市的市政建设经验、报刊媒体对于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国民交通规则观念的形成、理想社会价值观念的倡导,还可以为今天的城市交通治理提供些许经验和启示,让今日的红绿灯更加进步便捷,维持秩序、守护安全、服务交通、造福人民。

#### [参 考 文 献]

- [1] 邢建榕. 上海早期的红绿灯[J]. 都会遗踪, 2011(1). 李兰. 上海租界的安全秩序管理初探(1854-1927)[D]. 硕士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 [2] 李沛霖. 电车交通与城市社会: 1905-1937年的上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3] 张帆. 近代上海交通信号灯研究(1919-1937)[D]. 硕士论文, 河北大学, 2021.
- [4] 中国租界史料文献汇编. 电文电稿/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电牍 11 至 20·卷 132 至 141[DB/OL].
- [5] 交通史话: 上海最早的红绿灯[J]. 公安交通科技窗, 2003(5).
- [6] RED AND GREEN LIGHTS[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ursday, September 25, 1919.

- [7] 法租界添设红绿灯信号[N]. 民国日报, 1919-09-26.
- [8] 仁渊. 红绿灯[N]. 新闻报本埠附刊, 1934-03-05.
- [9] 布告[J].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 1931(25).
- [10] 肖君. 儿歌: 红绿灯[J]. 小朋友, 1933(534).
- [11] 沈天佑. 交通常识——红绿灯[J]. 儿童故事, 1948(2).
- [12] 襟江. 都市街道上交通红绿灯怎样自动变换[J]. 科学画报, 1940(8).
- [13] 理. 红绿灯[J]. 科学画报, 1944(7/8).
- [14] 章楚. 红绿灯之研究[J]. 警察月刊, 1935(3).
- [15] 徐庆明. 红绿灯下的交通警[J]. 红绿灯, 1946(7).
- [16] 交通警察常识: 红绿灯黄灯使用方法[J]. 青岛警察月刊, 1947(6).
- [17] 崔之宽. 红绿灯[N]. 新闻报, 1933-09-08.
- [18] 敷. 色盲之人驾车危险堪虞——宜改良红绿灯以资补救[N]. 新闻报本埠附刊, 1936-09-11.
- [19] 穿马路未看红绿灯[N]. 时报, 1939-03-09.
- [20] 王理卿. 红绿灯[J]. 华童公学校刊, 1933(1).
- [21] 红绿灯的笑话[N]. 浙江日报, 1946-11-04.
- [22] 尼耳译. 红绿灯之误[N]. 工商导报晚刊, 1949-11-22.
- [23] 皮尔士著. 詹姆斯·胡普斯编. 皮尔士论符号[M]. 徐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24] 独鹤. 红绿灯[N]. 新闻报, 1930-03-20.
- [25] 安全第一: 遵守交通规则, 服从警员指挥[J]. 警察画报, 1949(13).
- [26] 郝心泉. 交通灯的信号——坐汽车的也须服从[N]. 世界日报, 1946-02-07.
- [27] 柳穆. 红绿灯[N]. 新闻报, 1932-10-25.
- [28] 陶在东. 今乐府·红绿灯[N]. 新闻报, 1933-01-17.
- [29] 岳森. 从红绿灯说到法治[N]. 世界日报, 1947-02-08.
- [30] 罗忠恕.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N]. 大公报(天津版), 1945-12-07.

## Flickering Modernity: The Concept and Public Opinion of Traffic Lights in Modern China

Zhang Chenyi    Chen Zi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ed product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a, the traffic light w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management of many urban road traffic with the publicity of “progres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became the object used by the municipal authorities to publiciz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uling governmen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traffic light, which represents equality, has also been questioned for its imperfection. In the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till hidden discrimination of foreigners against Chinese, city residents against rural residents, strong against weak, high against low. At that time, people used traffic lights as symbols to illustrate their views on social values such as freedom, equality, justice,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ffic light as a perspective of municip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raffic safety knowledge publicity, national traffic rules awareness shaping, advocacy of social values and many other issues of the window, convergence of rich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notation, and for today’s urban traffic governance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Keywords:** the traffic lights; modern opinion concept; municipal construction; sense of rules; value to advocate

[责任编辑: 刘力]